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辨析^{*}

——基于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

严松

【内容提要】 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是关于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何以成为革命主体以及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实践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通过生产方式变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阶级矛盾与对立，由此，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退场论、重建论与转换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科学性的否定，冲击了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概念；另一方面是对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否定，消解了关于“人的解放”的革命旨向。这就需要突出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时代价值，厘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的在场方式、现实命运与斗争方式。在此基础上，明确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导逻辑，无产阶级也没有摆脱被压迫与剥削的命运，依然处于革命斗争主体地位。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马克思 无产阶级 革命主体 资本主义矛盾

作者简介： 严松（1988-），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58）。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似乎退出历史舞台，有产者与无产者间的鸿沟似乎日渐弥合，社会革命语境与情境不断弱化。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新政治革命主体”的一系列主张，企图重建新斗争主体与新对抗关系，在学理性与现实性层面消解了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时代在场，偏离了马克思对作为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历史缘起、身份标识和使命任务的经典语境。以暴力革命推进共产主义实现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社会开出的一条解放之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锻造出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让人类迈入“自由王国”。马克思的革命主体思想是否仍具有时代价值？西方学者对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否认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这需要在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本质、雇佣关系以及内在矛盾基础上给予正面回应，辨析数字技术赋能的革命主体，捍卫马克思的革命主体思想。

一、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基本内容与价值旨归

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主要关涉无产阶级何以成为革命主体、如何进行革命实践的思想体系，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二是“自为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资本主义‘文明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研究”（24BKS010）的阶段性成果。

出场方式与在场样态，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及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对以上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基本内容与价值旨归的解读，是我们考察与批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变异”的“革命主体”观点的理论前提。

1. 阶级理论：革命主体思想的前提

“阶级”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以探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何而来为出发点，得出了关于“阶级”产生的条件及其一般概念，即阶级是在分工与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上出现的，“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②。随着阶级社会的到来，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都隶属于一定阶级，阶级关系“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③，而一个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该阶级与怎样的生产力相联系、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④总是处于对立阶级关系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交往形式下的旧社会制度就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桎梏，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就成为社会革命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⑤。因此在阶级社会，哪个阶级是新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就是革命与建设的主导力量。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市民社会创造了挣脱封建联系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⑥，资产阶级随同自己生存条件日益完善而发展起来，并吞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阶级，也把曾没有财产阶级的大部分与原先有财产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⑦。判断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依赖出卖劳动力而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是主观劳动条件（生活资料）和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劳动者只是劳动力的所有者，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劳动条件，为了生存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者。正是在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存在，成为劳动者的统治者，在生产过程中吮吸着劳动者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提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⑧

2. 主体建构：革命主体思想的内核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3-744页。

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何作为。”^①对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该仅仅从“无产阶级”概念和结构层面进行直接的静态性考察，而应该也进行建构的动态性考察，“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确定为这一全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仅仅是直接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②，前者只能将无产阶级看成现实的资本家工厂中的自在的劳动者，后者涉及作为革命主体存在的“自为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作为“自在主体”和“自为主体”的两种属性进行了区分，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自在主体”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而形成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③，因此无产阶级“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④。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且与“劳动阶级”不是同一个概念。“自在的无产阶级”仅仅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概念，是在资本家工厂中作为雇佣劳动者存在的，其斗争形式是捣毁机器、罢工，目的仅限于经济方面的要求，他们还不能直接成为被马克思恩格斯赋予“资产阶级掘墓人”使命意义上的“自为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⑤而作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其斗争形式不仅包括经济斗争，还应该开展政治斗争，“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⑥，即无产阶级开始以暴力革命形式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目的在于使无产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掌握整个国家领导权。“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形成不是指自在阶级的形成，而是指自为阶级的形成”^⑦，无产阶级只有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革命主体”。“自为的无产阶级”的建构需要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者与领导者的“共产党”。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⑧这个政党就是共产党，只有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才能祛除无产阶级自发斗争的不彻底性、弱点，因此“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⑨。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及其整个运动利益的共产党人，不仅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革命思想，而且成为带领无产阶级展开斗争的领导力量。

二是作为无产阶级团结对象的“联盟者”。“工农联盟”是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⑩“合唱”就是要求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结“工农联盟”壮大无产阶级队伍。恩格斯强调农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和革命要素的主体价值，指出“农民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② 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4页。

⑦ 汪仕凯：《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争议话题》，《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3页注释①“编者注”。

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同盟军，大量的无产阶级也是来源于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群众。“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② 了解多数农民诉求、维护农民合理利益，是无产阶级团结广大农民的基本工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列宁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们将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广泛团结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同盟者的支持。

3. 人的解放：革命主体思想的旨归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是“人的解放”的现实场域。“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③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社会”是超越市民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存在，是市民社会的替代物。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开拓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生产关系，规定了每一个国家公民都享有政治上自由与平等的权利，经济上自由劳动和交换商品的权利。此种自由与平等的生产关系就得到了一种“合理”意识形态的掩饰，让工人阶级误认为此种生产关系是正当的与合理的，因此不是对抗而是承认和接受现实的冲突。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组成贫困阶层，他们所获得的自由与平等仅仅是表面上的，因为他们作为交换价值的另一方，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出现在交换市场上的，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相应的报酬，自身没有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被支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④。“现实的个人”只能“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⑤。基于对此种“物化”状态的考察，马克思提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个人才能作为“社会化人类”将自我融入社会整体，建立“人类社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人的解放”的实现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共产党人如何介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生活，得出了“永恒革命”的结论。在考察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现实的革命运动基础上，分析这些革命的结果及其未来走向，进而得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的过程^⑥，提出了实现对现行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抗以及过渡到超越资本主义下一个环节的革命方法。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资产阶级不会主动放弃政权，而是会通过一系列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自救，从而继续维持其权力，无产阶级想要获得政权，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⑦，在共产党带领下，觉醒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⑧。以革命手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社会开出的一条解放之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给现实世界带来什么的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只有在这样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中，人才能摆脱一切“商品拜物教”的统治，才能从“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化”中走出，实现真正的“人之自由个性”。

“自由王国”是“人的解放”的社会载体。“自由王国”是相对于“必然王国”的社会形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①“必然王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与“人”关系的颠倒的颠倒，人成为统治物质的主体，不再以“物的依赖性”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必然王国”中生存的人还没有实现自我的真正解放，还不是作为“自由主体”存在，仍被束缚在特定的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还是出于一种生存层面的需求，属于“必要劳动时间”范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②“自由王国”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终止了“必要性和外在性规定”的强制性劳动，开启了“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③。只有当劳动成为解放人的手段，劳动成为人的内在需求时，人的解放才能彻底实现。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学者关于革命主体嬗变的代表性观点

数字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引领人类开启了一系列变革。数字技术引领的时代变革导致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主体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出现了革命意识的倒退。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开始考察革命主体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进路：一是提出革命主体退场论。这些学者通过研究数字时代社会对抗与冲突的技术特征，分析了数字技术对于革命的关键作用以及谁是掌握作为革命工具的数字技术的主体，得出了无产阶级消亡的结论。二是提出革命主体重塑理论。这些学者通过研究数字时代社会对抗与冲突的群体特征，企图打破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既定性，将更多“生成性”与“多元性”因素注入革命主体之中。三是提出革命主体转换论。一些学者基于社会关系建构视角，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在现代技术社会已经被数字资本“收编”，不再具有革命的意识与行为。在数字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革命主体应当转换为一切被数字技术规训与控制包括从事各种“非物质性”劳动在内的诸众。

1. “无产阶级消亡”：革命主体的退场论

马克思在考察与论证“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时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④以尼克·斯尔尼塞克与哈尔特穆特·罗萨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家从马克思这段话中获得“灵感”，一方面，认为只有相较于更先进的生产力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被称作一种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提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仅仅依靠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远远不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9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必须以更发达的生产力为工具（或武器），这种生产力形式已经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逐渐表现出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加速跃迁，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生产力，逐渐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便会如期而至。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家进而指出，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被摧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于技术武器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但是现实却是这些武器被数字/平台资本家牢牢掌握在手中，且通过数字资本加持不断进化。无产阶级要想从这些资本家手中夺取技术武器，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基本上遥不可及甚至毫无希望。因此，消灭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基于上述论述逻辑，以塞德里克·迪朗、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约迪·迪恩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脱离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探究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发展形态问题，认为在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受到了来自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产生的垄断形式的影响，出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主体”，这一主体是数字化时代脱胎于资产阶级的新资产阶级权贵，被称为掌控头部科技企业的大数字资本家。这些大数字资本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武器渗透或控制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数字技术垄断遏制其他新型技术发明以及阻拦代表新型技术的新科技企业崛起。数字平台、知识产权成为他们的“领土”，这种垄断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方法与封建主义的土地兼并何其相似，这些头部科技企业与封建主义式的贵族食利者又是何其相似。“以投资、创新与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以暴力征收租金的封建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增强以及新等级制的出现则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①科技巨头逐渐转化为收租者与食利者的“封建领主”，以“征收”代替剥削的获利方式，不仅使得社会创新与投资欲望逐渐降低，而且不断侵蚀着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民主与法治，并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差距与新的两极分化。这种数字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被西方左翼学者称作“技术封建主义”。西方学者似乎正在达成这样的共识：资本主义终结之后并不意味着更美好未来的到来，相反，当今社会正在退回封建主义。无产阶级在这样的社会根本无法作为革命主体存在，而是正在倒退回基于“人的依赖关系”的封建劳动者序列，从而面临消亡的境遇。

2. “新的革命主体”：革命主体的重建论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去中心化、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出现了种种“价值错位”现象，现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错位结果比马克思的预测更为深远。这就要求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对马克思有关社会行为主体和社会对抗的概念加以激进化和变革”^②，“错位”产生了新斗争主体与新对抗关系，为当今资本主义新反抗力量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以“新社会运动”“连结”而成的多元主体置换“旧社会运动”的革命主体，即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连结”是一种话语连接^③，即以话语联合多元主体、凝聚多元的社会对抗力量，获得话语领导权。多元对抗力量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④在内的“新政治主体”或“弱势群体”，也就是以“边缘群体”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因此，在拉克劳和墨菲的视域中，以话语连接的多元主

① 吴鑫：《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③ 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④ [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体进行的反抗斗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基于话语媒介实现以达成“冲突性共识”为基础的多元化抗争。由此他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及其总体性革命策略，探寻阶级之外的多重社会身份与关系组成的“大众同盟”及其建构的新的革命主体，但是其结果往往是陷入无主体的政治。

齐泽克指出，“互联网天生就是‘共产主义’的，是社会（化）知识的实体化，是集体心灵的直接化身？是否可以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这样说，互联网已经‘自在’地是共产主义的”^①，从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可以窥见数字共产主义未来建构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数字共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动员革命主体，这个“革命主体”是“一个比无产阶级主体更激进的概念，一种被还原到笛卡尔‘我思’这一转瞬即逝之点的主体”^②，这意味着主体生来就处于一种身份感内在缺失与匮乏状态。“原初的空隙，符号结构的这一短缺，就是主体”^③。主体内在的匮乏感总是驱使其无休止地追求稳定和完整的状态，参与一系列身份认同的革命实践。以身份认同为驱动力建构的革命主体是“新无产阶级”，具体包括以下两类：一是与数字化时代特征相符合的并受到数字资本剥削的流动性、多元性的少数边缘群体；二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被剥夺了传统、宗教、种族方面支撑的贫民窟居民，他们直接被抛入必须寻求联合的情境当中^④，成为被迫聚集在一起的巨大群体。这两类都属于“被排除者”行列。因此，“新无产阶级”与马克思描述的“无产阶级”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虽然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却与先进的生产方式脱离，后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直接产物，直接与先进生产方式相互联系，占据整个生产循环的关键位置，是一切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总称（当然包括贫民阶层）。齐泽克在此意义上缩小了马克思关于“革命主体”界定的范围。

3. “逃离技术的规训”：革命主体的转换论

从无产阶级产生的背景来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被资本关系塑造的结果而已，二者是一体两面，因此用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来推翻资本主体是不可能的。基于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塑造的^⑤观点，哈特和奈格里试图在无产阶级之外寻找其他未被资本主体收编的革命主体，提出了“诸众”概念作为反抗“帝国”的主体力量，这已经完全脱离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范畴。随着技术革命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与主权国家式微，逐渐形成了“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帝国”^⑥。不同于传统的帝国主义，帝国是一种“网络权力”，主要构成成分或节点既包括主要的民族国家，也包括超国家的机构、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和其他权力形式，因此是一种“新帝国”形式。在新帝国形式下形成大量深受国际资本剥削、居无定所、屈从于数字技术的“流民”，即“诸众”，“诸众”与传统无产阶级的社会劳动主体概念完全不同。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马克思视野里，无产阶级是一个封闭的、排他性的概念，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狭义的工人阶级，只包括产业工人，而不包括农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二是广义的工人阶级，指所有雇佣工人，不包括那些贫穷的、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者和其他没有报酬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7页注释1。

② Slavoj Žižek,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e, 2009, p. 92.

③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④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pp. 268-269.

⑤ 参见[加拿大]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0-91页。

⑥ 参见[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2页。

的劳动者，而“诸众”却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概念。

“诸众”是平台资本与算法技术开创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建构了“非物质劳动”的劳动形态，打破了劳动的时间与地域限制，不仅扩展了资本剥削劳动的场域，使得劳动场所向人的生活、休闲场所入侵，而且延长了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时间，使得劳动时间向人的自由、闲暇时间入侵。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与生产领域之外的任何场所与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的剥削系统，在这个系统下被剥削的群体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指”的产业工人与雇佣工人的界限，而扩展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屈从、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训与管控的所有个体——诸众。维尔诺把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和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提出了“智力劳动力”概念，重构了“作为主观性”亦即“非物质性”的诸众，“缺乏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后福特制的劳动者是诸众”^①，诸众是后福特制体系下的革命斗士，是新的共产主义革命主体。在此意义下，“因剥削而陷入困境并由此获得反抗现存的革命力量的主体不再是从事雇佣劳动的产业工人，而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屈服的所有人”^②，即被数字技术规训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诸众应当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的革命主体。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在场性与引领性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是“以数据化和智能化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③，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只是“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不变资本”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效率，改变了活劳动在数字化生产中的在场方式，劳动者从直接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但是并没有改变“可变资本”雇佣的劳动者是剩余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劳动者仍然处于被雇佣并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现实命运之中，只不过此种创造活动处于数字资本监视下的数字劳动过程之中。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导逻辑，无产阶级也没有脱离被压迫与剥削的命运，依然处于革命斗争主体地位。无产阶级需要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不断掌握与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联合斗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阶级统治。

1.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的在场方式与本质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有没有消灭无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是什么，二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在场方式是什么。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得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和雇佣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性质及其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因此，作为现实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消失。

第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性质。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有没有消灭无产阶级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要判定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有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无产阶级产生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出现，如果数字资本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革命主体地位也必然瓦解。资本主义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而资本增殖必须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与劳动存在着天然对立。数字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并逐渐成为渗透与融入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新的技术工具，在释放了更多生产力的同时也极大便捷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是数字资本主

① [意]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4页。

② 苟娇、韩秋红：《当代西方左翼革命主体理论三条进路》，《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

③ 洪燕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中国式数字文明建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义阶段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增殖逻辑，仍然存在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不过此种对立发生了形式的变化，即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对立。数字资本是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所形成的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技术上更加完善的资本新形态，但本质上仍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其对获得高额利润有着疯狂欲求，根据“ $\text{剩余价值率} = \text{剩余价值} / \text{可变资本}$ ”的公式可以得知，剩余价值率提高与剩余价值成正比，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依赖于改进生产技术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因此，资本投资数字技术并逐渐演化成数字资本，其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而达到资本增殖的根本目的。数字资本的积累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剥削数字劳动实现的。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在场方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劳动方式与场景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智能化、便携式、触屏式的电子设备为劳动者带来了更加便捷、更加愉快的劳动体验，劳动者不再需要通过体力操纵机器，也不再需要被固定在某个场所，更不需要有严格的工作时限。劳动者似乎从生产的参与者逐步变为生产的旁观者，更多以“一般智力”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过程。但是，劳动者工作的“新场所”——数字化界面与平台仍然归属于资本家，在工业文明时代只能从事机械化的重复性、强制性劳动的产业工人变成了聚精会神操作数字化界面并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劳动的技术工人：第一个层级是专业性的数字劳动者^①，第二个层级是零工型的数字劳动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第三个层级是用户型的数字劳动者^②。这里的“劳动者”仍没有超出马克思所说的失去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范围，是受控于资本逻辑体系、没有数字化生产资料并受雇于数字资本家的数字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样成为了剥削的对象”^③。同时，在依托平台从事商品生产与买卖的实体工业企业中依然存在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这些雇佣劳动者当然属于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再者，数字平台资本家并不是脱离了无产阶级的纯粹“食利者”，他们赖以生存的平台以及为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提供生产与销售的参考“数据”都是由数字劳动者建设与生产的。“平台资本”本身也投资或直接关涉实体经济，甚至“平台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已经融为一体，例如特斯拉^④。因此，数字平台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合谋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劳动者的共同体。

2.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的现实命运与立场

第一，数字监控与无产阶级的当代命运。数字文明时代创造的数字技术工具已经成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甚至可以说，人离开智能化的手机、电脑以及网络就无法在现代社会生存。但是，数字技术也成为一种监控人的手段，甚至是一种“全景敞视”的监控，即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打破了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界限，工人原本在工作场所与工作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生活场所与生活时间也

① 专业型的数字劳动者包括：一是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与传输算力的雇佣劳动者，二是参与数字化界面与平台的建设、维护与运营的雇佣劳动者。

② 进行电子交易、网页搜索与浏览、社交聊天、网络游戏、智能导航等行为的网民群体，为数字资本家提供了可以被收集并能产生巨额经济收益的“原始数据”，这些由网民的网络行为创造的“原始数据”被各数字平台当成具有无限增殖能力的“物神”。

③ [瑞典]福克斯、[加拿大]莫斯科：《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④ 特斯拉（Tesla）相较于传统车企来说，其真正的竞争力在于对数据、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的熟练整合与运用，并把三种技术模式凝聚成了特斯拉神经网络，即一套将传感器、数据、通讯、CPU、外围硬件与软件紧密结合的超级系统。此种超级系统产生的根源在于对车辆驾驶员驾驶过程行为的数据分析与整合，驾驶员在车上的一举一动，比如打方向、刹车或踩油门，都是特斯拉需要的数据点。这些采集到的数据会被特斯拉“投喂”给自家算法，升级后的算法又会通过OTA“反哺”给特斯拉的车辆。而每一次算法升级都是特斯拉软件的“卖点”，让软件数据的生产者亦即消费者付出更高的购买代价。在此意义上，特斯拉既是一家生产汽车产品的传统企业，又是一家互联网时代的数据整合与分析的公司。

都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劳动场所与劳动时间。同时，工人不仅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受到来自日益完善的工作守则、效益原则以及监控设备的支配，在生活场所与生活时间的劳动也都受到了来自数字技术的监控，劳动在此情形下也就成为工人“‘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①，劳动者在劳动场所之外也要进行无休止的为资本家打工的劳动，“劳动溢时和时间剥夺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隐秘、最普遍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剥夺方式”^②。数字资本主义就是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无限扩展劳动者的劳动场所（一台无线电脑设备就能随时随地进行工作），也就充分占用了劳动者的时间，而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一切价值都被其服务的资本家无偿占有。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③。“数字技术包裹下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④，广大劳动者不仅仍然处在由物质性生产劳动支撑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剥削体系之中，而且又被整合到由数字技术及其建构的新的机器生产体系之中，受控于数字资本增殖逻辑，并成为数字资本的剥削对象及其价值增殖的来源。

第二，“边缘群体”的现实命运及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各类“边缘群体”作为“新型政治主体”能否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新的现实革命主体，我们首先要考察“边缘群体”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边缘群体”并不是与数字技术成果完全隔离的存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与数字时代的技术成果紧密联系：一方面，“边缘群体”表达自身的诉求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智能手机、数字平台）。他们会将这些智能设备与网络技术当成彼此沟通的手段，加深了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强化了彼此间的价值认同，进而增强了集体行动的意识。正如维斯福特在研究“边缘群体”时明确指出的，“被边缘化者的暴动”将手机作为武器来对付他们反击的控制性的安全设备——视频监控、电脑分析、预测和先发制人的警务、高科技监狱^⑤。另一方面，“边缘群体”了解社会信息与进行谋生也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首先，他们在一系列网页搜索与浏览、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电子交易等网络活动中，也不自觉地为数字资本家制造大量的由他们生产但是却不归他们所有的“原始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边缘群体”属于“用户型数字劳动者”。其次，一些“边缘群体”本身也是依赖数字技术进行谋生，即一些贫民窟居民、家政工作者通过数字平台寻找能够养活自己与家人的工作，他们或是成为网络空间的自由职业者，或是依赖于数字平台进行线下工作，属于“零工型数字劳动者”。我们还要考察“边缘群体”中的“信息穷人”，他们是处于网络社会边缘的“功能性文盲”（不懂得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或者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可替代的普通劳工”，主要包括偏远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群体以及占很大比例的老年人群体。这些边缘群体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是被压迫者，但是难以成为革命斗争的领导和主体力量。概言之，“边缘群体”中大部分属于无产阶级，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界定的无产阶级范畴；西方左翼学者以“边缘群体”取代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尝试，很容易使革命主体丧失先进性与组织性，模糊了斗争目标、分散了革命力量。

3.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的斗争方式与结局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现实革命的主体，作为现实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数字时代的在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② 姜英华：《论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④ 孟庆龙、刘云杉：《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5期。

⑤ 参见〔加拿大〕尼克·迪尔-维斯福特：《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燕连福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0页。

方式以及未来命运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无产阶级的性质与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无产阶级的本质是终结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推进人类历史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革命主体，是因为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一方面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直接联系，具有先进性特征；另一方面又是被剥削和压迫的一方，具有革命性特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必须进一步发挥其先进性与革命性的特质，凸显其革命主体面相，才能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①，进入“人的自由个性”阶段。

第一，革命主体掌握数字技术的现实需求。被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训的“诸众”仍然处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中，他们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紧密，作为最先进生产方式的数字技术不过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②，成为资本家直接占有并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机器，形成了代替人类劳动的“一般智力”对象化知识力量，使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在资本有机机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一般智力（或科学知识）’的应用”^③。由此可见，即使劳动者从生产直接参与者逐步变为生产旁观者，但是“一般智力”背后仍然是大量劳动者体力与智力的耗费。如何使无产阶级在数字时代获得自身解放？马克思曾提出，“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④。机器的人格化，并反过来规制着它的制造者的生产，使得人受机器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控制由其创造的作为生产资料的先进机器与技术，才能“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可能路径在于，普罗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要掌握这些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革命性影响的技术”^⑥，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逐渐使技术成为异化于人并统治人的“工具”。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技术逐渐成为嵌入并控制人类社会生活、生产过程与政治结构的“超级权力”，而谁掌握数字技术谁就能成为权力主导者，掌握与控制数字技术是无产阶级获得现实权力与实现自我解放的现实准备。

第二，革命主体运用数字技术的联合斗争。平台经济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工人在不同行业就业的流转与培训，全面提高了劳动者的能力^⑦，劳动者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劳动者掌握数字技术的熟练程度提高与创新欲望的增强，在生产与创造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对机器与技术“工具化”认知以及对自我“主人翁”地位的肯定，增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劳动者解放自身的现实需求。但是“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⑧，这就要求劳动者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主体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虽然为无产阶级带来了工作环境、收入水平以及福利待遇的提升，但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因此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己性”，甚至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字拜物教”。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广大无产阶级提供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③ 赵林林：《数字化时代的劳动与正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⑥ 蓝江：《从技术加速到云租金——如何思考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⑦ 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⑧ [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4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交往媒介，一方面让全世界劳动者能够了解各国无产阶级工作现状以及争取权力的斗争情况，进而生发对无产阶级的同情以及自我成为无产阶级一员的现实必然性，助力“工农联盟”的组建，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工人或工人组织之间的合作与联合，有效增强了工人队伍的凝聚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标具有了进一步实现的媒介基础。

第三，革命主体需要先进政党的领导。“马克思的观点是需要由资本的自主运动形式所导致的作为异化潜能的现存方式中发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规定性，而要把这种潜能变成现实，恰恰必然要通过自我扬弃的无产阶级有意识的革命行动”^①，“无产阶级有意识的革命行动”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而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必须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能够取代或超越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主体”之所以不是“真正的革命主体”，就在于他们没有考察也没有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存在。西方学者关于“新型革命主体”的建构方案总体停留在激进的理论层面，并没有从现实层面探究在共产党带领下的无产阶级通过具体革命运动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无法企及集思想、运动与社会形态三重意蕴于一体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同时建构方案也少有涉及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当代诠释的中国式数字文明，因而缺乏实证性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组织性与引领性的特质将在数字技术赋能条件下进一步强化，共产党以数字技术为媒介能够更好地在无产阶级群体中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引领无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带领下的无产阶级自为革命实践活动，必然能够消灭一切剥削与压迫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②，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③。

参考文献：

- [1] [美] 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 [日] 渡边雅男：《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李晓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3] 夏莹：《从批判到抗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嬗变及其当代形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
- [4] 姜辉等：《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5] 罗骞：《现代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 [6] 仰海峰：《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体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 [7] 张一兵：《反抗帝国：新的革命主体和社会主义战略——奈格里、哈特〈帝国〉解读》，《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
- [8] 林哲元：《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四种对抗到新无产阶级——论齐泽克的革命主体论》，《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

(编辑：黄华德)

① Guido Starosta, “The System of Machinery and Determinations of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in the Grundrisse and Capital”, in Guido Starosta and Peter D. Thomas (eds.),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Riccardo Bell of Iore,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p. 23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71页。